

宋代江汉平原城镇的发展及其地理初探

杨 果

作者 杨果,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; 武汉, 430072。

关键词 宋代 江汉平原 城镇地理

提 要 宋代是江汉平原城镇发展的重要时期。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提高, 江汉平原江河纵横、湖泊密布、航运便利的地理条件得以发挥其优势。城镇不仅在沿河运交通线上大规模产生, 而且出现于平原中腹地区, 江汉平原的地理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

关于江汉平原地域范围的确定, 迄今没有统一的标准。本文所讨论的江汉平原, 主要依据地貌类型, 其地域范围大致以平原外围 50M 等高线为界, 西起枝江, 东至黄石, 北达钟祥、安陆, 南迄湘鄂边界。包括今湖北汉阳、汉川、天门、仙桃、潜江、荆州、公安、石首、监利、洪湖等 10 县市全部和黄石、大冶、鄂州、黄冈、黄陂、新洲、武汉、松滋、云梦、孝感、应城、安陆、钟祥、荆门、枝江等 15 县市的平原部分。

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在两宋时期皆属于荆湖北路, 小部分则分别隶属于京西南路、淮南西路和江南西路。北宋时分为 2 府, 4 州, 3 军, 5 监^①, 22 县; 南宋时分为 2 府, 4 州, 4 军, 7 监, 20 县。

从城镇发展的角度看, 一般来说, 每一州(府、军、监)治、县治即为一规模不等的城镇。虽然少数州, 如兴国军(治今湖北阳新县)的治所不在江汉平原, 还有一些州、县的治所并非固定在一地, 而是曾有迁徙, 但本区州、县级城镇至少超过 20 个。其中有的府州级城镇的规模相当可观, 堪称大型城市。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, 莫过于南宋时期的鄂州城(今武汉市武昌区)^②。其它府州级城镇也有一定规模, 即如被知军黄干自称为“斗大之郡”的汉阳军(治今武汉市汉阳区), 其军城“内外户口不下三千人家, 又有船居四百只”, 人口也在 1.5 万以上^③。

在宋代江汉平原城镇中特别值得注意的，是县以下镇、市的发展。

“镇”原是以军事职能为主的行政单位，宋惩唐末五代藩镇跋扈之弊，于建隆三年（962）诏置县尉，削夺镇将权力，所存者称为监镇，掌警盗烟火兼征收商税。镇至此摆脱军镇色彩，以商贸市镇出现于经济领域。北宋中叶的《元丰九域志》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正式记载“镇”的地理志。由此可见，镇的发展在此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在宋人看来，镇与县的主要区别是“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，则为镇”^④。据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，当时全国有镇 1871 个，其中江汉平原有不少于 30 个^⑤，此后又有所增加^⑥。

“市”是商品交易的场所。作为农村集市的草市，始见于南北朝时期。中唐以后，手工业、商业的兴盛和水陆交通的发展，促使草市大量兴起。宋时，在州县治所附近、交通要道两旁、关梁津渡之处，都出现了众多的草市，它们或以“市”命名，或被称作坊、场、店、务等等，成为官府征收商税的对象^⑦。全国草市的数量无法确知，仅据熙宁九年（1076）毕仲衍《中书备对》有关坊场河渡 27600 多处的记载^⑧，便可知草市相当发达，其中一些即属于江汉平原的范围之内，如“买扑江陵府亭陂等四十五处河渡”^⑨等，不胜枚举。虽然很多草市聚散不定，变动较大，但其中的一些或上升为镇，或其实际规模包括人口、商税甚至在镇乃至县之上，如江陵（今湖北荆州市）附近沙头市和鄂州城外南草市，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。沙市是“四方之商贾辐凑，舟车骈集”的商埠，年商税额超过江陵^⑩；鄂州南草市号称“沿江数万家，廛闹甚盛，列肆如栉”^⑪。因此，本文所讨论的“城镇”实际上也包括这些草市。

笔者对宋时期江汉平原乡镇以下的市镇、草市作过考订，统计出各类集市、草市百余处，其详参见下表。

宋代江汉平原镇、市一览表

府州	县	镇	市	监	其他	县	镇	市	监	其他
江陵府 (1)	松滋	1	2		3	枝江		1		4
	江陵	4	1	1	4	公安	2	1		3
	石首	1	2		4	监利	2			4
	建宁					潜江	2			
复州	景陵	5				玉沙	2	1		8
荆门军	长林	7	1		7					
汉阳军	汉阳	2	1	2	6	汉川	1			1
鄂州 (2)	江夏		3	1	5	武昌	2	1	2	3
安州	安陆					云梦				
	孝感	2	1			应城			1	
郢州	长寿	7			1					
黄州	黄陂	1				黄冈	1	2		2
兴国军	大冶	2		1	2					
合 计		镇 44 市 17 监 8 其他 107 (3)								

资料来源：《宋会要辑稿》、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、《元丰九域志》、《舆地纪胜》、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、《嘉庆一统志》等。笔者对此有另文详考，此略。

(1) 建宁县南渡后省，并入石首。另，江陵府还有沙冈务、山口务、白莒市及“买扑陂亭河渡等” 45 处，地望暂无考。

(2) 鄂州另有白湖铺、湓口铺等地望不详。

(3) 含江陵、鄂州境内地望不详的沙冈等市、务 50 处。

表中可见，两宋时期江汉平原先后有州县级城镇不少于 20 个、乡镇 44 个、监 8 个，其它各类草市 124 个。本表并不完备，例如安陆县、云梦县镇市数为零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；另外，其中一些镇市（特别是市）处在比较经常的变动之中，表中的数据并不能准确说明情况。不过，本表大体可以反映镇市的整体面貌、分布情况，可以作为分析的基础。

二

江汉平原是长江、汉江及其支流交汇地带的冲积湖积平原，北靠大洪山，东连大别山和鄂东南丘陵，西邻鄂西山地，平原内河流沟渠纵横，湖泊堰塘密布，水资源丰富，航运条件优越，这一自然地理条件极大地影响了该区域的城镇分布。

首先，河运是宋代江汉平原城镇成长的主要因素。

本区大多数城镇都分布于江河湖泊交通线旁，具体区位可分为三类：

1. 河流交会点。数条通航河流汇合的地方往往有较大量的人流、物流在此集散、中转，因而是城镇发育的良好区位。如汉阳军、鄂州城位于汉水与长江交汇处；黄州城（今湖北黄州市）位于岐亭河入长江口；沮水、漳水和富水的汇集滋养了汉川城（今湖北汉川县）。2. 梯级中转点。长江出三峡后即进入峡州（治今湖北宜昌），滩险流急、航道狭窄的江面变得宽阔，水流平缓，出川的船只通常在此修整，中转活动促使峡州城发育。峡州以下的江陵、沙市的发展，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。宋代川盐大量东下，沙市是重要中转口岸。陆游在这里“迁行李过嘉州赵青船”，换乘入川的船只；又说距沙市三四里的新河口，“盖蜀人修船处”^②，都说明沙市是蜀船的终点。3. 过河点。河道较窄或水流平缓便于架桥或摆渡的地方，往往容易出现镇市，例如今枝江赫家洼，地处百里洲北侧的内江，“古时本一苇可杭”，“有港，有桥梁津渡”^③，是宋代规模较大的商业口岸，考古工作者曾在此发现大量宋代瓷器及瓷器残件^④。

从本区陆路交通对城镇的影响，可从另一角度反衬宋时期河运对本区之重要。

宋代以前，本区内以江陵为中心，北上襄阳（今湖北襄樊市），南下鼎州（治今湖南常德），纵贯南北的陆路交通干线地位十分重要，江陵能成为一方都会与此密切相关。入宋以后，由于都城先后从唐代长安（今属陕西）东移至北宋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、南宋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，更加上水路运输之便利低耗，使得原有陆路干线作为全国南北交通主道的地位大大下降，沿线的一些城镇逐渐衰落，襄阳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本区内，荆襄道上重要城镇之一荆门（今湖北荆门市），在唐时是一派“马声得得荆门道，蛮水扬光色如草”^⑤的景象，入宋后逐渐衰落，南宋初加上战争的破坏，更是城邑萧条，“坊郭不满五百家”^⑥。江陵的情况则不同，由于它不仅仅是南北陆路交通线的咽喉，同时又是东西水运交通线的枢纽，所谓“凡浮江下于黔蜀，与夫陆驿自二广、湖湘以往来京师者，此为咽喉”^⑦，所以入宋后仍能避免衰落的命运。

不过，尽管陆路交通的地位大不如前，但仍对城镇的成长发挥作用。前面提到的峡州作为水运中转点而城镇发展水平却远在江陵之下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峡州陆路“极天下之艰险”^⑧，基本上无路可行。

其次，区域地形条件对城镇的分布也有很大影响。

江汉平原东、西、北三面与丘陵冈地连接，中腹为河间洼地。在平原边缘向丘陵过渡或平原与丘陵交会的地带，通常具有古代城镇建设所必备的良好防卫、交通、农业基础等条件，

而平原中腹虽然水资源丰富,但排灌能力较差,开发难度较大。历史上人类活动的一般规律总是先岗地后湖区,道理正在于此。两宋时期由于人类治水能力有很大的提高,平原中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,城镇的数量和分布比过去扩展。唐代时,本区有20县,宋代除将唐沔阳县(今湖北仙桃市西南)废为镇外,新增设了潜江(今湖北潜江市西北)、建宁(今湖北石首市境内)、玉沙(今湖北洪湖、监利之间)3县,增加的数量不算多,但值得注意的是,这3个县都位于江汉平原腹心地带。不过,从总体上说,宋代江汉平原的边缘丘陵冈地尚有较大开发余地,因而人们仍然倾向于避开低洼易涝的平原湖区。于是,同在江汉平原,平原腹地与平原边缘的情况很不相同,平原边缘发育较早的城镇如江陵、鄂州等继续扩展,分别成为平原西部和东部的中心城镇;其它如黄冈(今湖北黄州市)、长寿(今湖北钟祥县)、江陵、松滋(今湖北松滋县西北)等多个县级城镇也都分布在平原边缘地带。而在湖泽密布的平原中腹则城镇既稀且小,有的地区甚至还是空白,如沌水两岸的一些地段还根本没有开发,人称“百里荒”^①,与平原边缘城镇相对较密而大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。

第三,城镇地理位置的特殊性,往往决定了城镇功能性质的特殊性。靠近矿体的城镇通常以矿业生产为主,如兴国军大冶县(今湖北大冶县)是冶铁业的中心。临近江河的城镇多半是商贸港口,如江陵“北客随商贾,吴樯间蜀船”^②;如鄂州“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,货物之至者,无不售,且不问多少,一日可尽”^③;还有些镇市规模虽小,但也因临江河交通线而便于贸易,汉阳鹦鹉州至沌口之间的金鸡洲即是如此,“洲中有聚落,如小县。出鲟鱼,居民率以卖鲟为业。”^④靠近边界且兼有平原、丘陵、河湖的城镇,往往是战守防卫的中心,如鄂州,既是商贸港口,又由于接近宋金战争的前线,地理位置特别重要,“实荆襄之肘腋,吴蜀之腰膂,淮南江西,为其腹背,四通八达”,因而不仅“商旅辐凑”,而且“兵民错居”^⑤,具有重要的军事职能。鄂州以东30里的杨夹口,也“居民及泊舟其多,然大抵皆军人也”^⑥,是一个以军事为主的聚落。

另外,值得注意的是,城镇的地理位置并非一成不变。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、海平面变化以及新构造运动等自然因素的影响,另一方面由于入宋以后人类活动的加剧,尤其是修筑堤防、围湖垦田之类活动的频繁,使得江汉平原洪水位上升,近5000年来荆江洪水位上升量约为13.6米,其中宋代以来大约上升了10米^⑦,因而一些沿江城镇尤其是州、县治所在的城镇,由于洪水过程显著,城址安全受到威胁而纷纷搬迁,如公安县“沙虚岸摧,渐徙而南,今江流,乃昔市邑”^⑧之类。北宋时的枝江、松滋、潜江等县治均不在今址,大体来说,今址都是逐渐远离了当时的河岸。水文条件的变迁对城镇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。

还应该看到,自然地理条件对于城镇的成长、分布有很大影响,但它毕竟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或一种可能性,城镇作为人类所创造的最重要的人文地理景观,它的出现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。生产方式是从更高层次上影响甚至决定城镇形成发展的因素。如果没有唐宋以来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,没有劳动人民治水能力的提高,没有大量北方劳动人口的南迁,宋代江汉平原城镇的发展是不可能想象的。

注 释:

- ① 监的情况比较复杂,一般来说,监与府、州平级,但也有与县同级者,多是经济上有独特意义的地区,如鄂州宝泉监,在州东2里,熙宁八年(1075)置,铸铜钱。参见《宋史》卷88,《地理四》。

- ② 陆游《入蜀记》卷4称鄂州“市邑雄富，列肆繁错，…虽钱塘、建康不能过，隐然一大都会也。”戴复古《石屏诗集》卷1“鄂州南楼”诗云：“江渚鳞差十万家”。叶适《水心先生文集》卷9《汉阳军新修学记》则说鄂州是“今之巨镇”。
- ③ 《嘉靖汉阳府志》卷6，《宦绩志》引黄干疏。以3000户、一户5人计，应有1.5万人。
- ④ 高承：《事物纪原》卷7，《州郡方域部·镇》。
- ⑤ 《元丰九域志》有关镇的记载并不完整，如未载吉阳镇，据《宋会要稿·方域》六之三三，吉阳原为县，开宝二年（969）废为镇，属孝感县。
- ⑥ 如沙市镇，南宋建。参见周必大《文忠集》卷65，《淮西帅高君神道碑》。
- ⑦ 参见《宋会要稿·食货》“商税”
- ⑧ 周宝珠先生对此做过研究，参见其文：《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》，载《史学月刊》1998年第2期。
- ⑨ 《宋会要稿·方域》一三之一四。宋朝规定，商税年额在一千贯以上的派官监临，不及千贯的允许人户扑买。
- ⑩ 王象之：《舆地纪胜》卷65；《宋会要稿·食货》一六之一三“商税税额”。
- ⑪⑫ 范成大：《吴船录》卷下
- ⑬⑭⑮ 《入蜀记》卷5
- ⑯ 同治《枝江县志》卷2
- ⑰ 田海峰：《略谈赫家洼和梁子湖的青白瓷》，载《江汉考古》1985年第3期。
- ⑱ 《荆门州志》卷36《文苑》，引温庭筠《常林欢》。
- ⑲ 洪适：《盘洲文集》卷49，《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》。
- ⑳ 刘挚：《忠肃集》卷10，《荆南府图序》。
- ㉑ 《吴船录》卷上
- ㉒ 参见：《入蜀记》卷5，《吴船录》卷下。
- ㉓ 苏轼：《荆州诗》
- ㉔ 罗愿：《鄂州小集》卷5，《鄂州到任五事札子》。
- ㉕ 《入蜀记》卷4
- ㉖ 周凤琴：《荆江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》，载《历史地理》1988年第4辑。

（责任编辑 吴友法）